郑观应的海防思想（下）

撰文/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他围绕“攻”与“防”、“巡”与“守”两方面的论述，较之左宗棠的海防战略思想更具体、更实际，对后来的海防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半个世纪反侵略战争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国的国防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海防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外洋与海口兼守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使二者并重成为可能。因此，郑观应认为，“若不守外洋，则为敌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为敌人所据，施放枪炮，四乡遭毁。彼必得步进步，大势危矣。” 所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在战术上，郑观应主张以蚊子船配合炮台、兵轮守住海口，快碰船、鱼雷艇则用来巡防外海，三洋海军互为声援，“敌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藉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敢者，鲜矣！”

为实现外洋与海口并重的海防战略，郑观应特别强调以下两点：首先，郑观应特别强调在海防建设中应该坚持炮台与战舰建设相结合，建立沿海防御带。他认为在沿海地带设立炮台是加强海防的有效手段，炮台与战舰在战争中分别起着不同的作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用，二者都不可偏废，“有兵船而无炮台，则能战而不能守，外强有余者，而内固恒患不足。”在炮台的设置上，应以炮台为中心构筑炮台阵地。“于沿海要隘，多筑炮台，悉如西式，环之以水雷，护之以水中冲柜，沿海断续之处，补之以浮铁炮台，使之与外洋之水师、战船相表里。”在战船建设上，则以铁甲舰为帅，以蚊子船、轮船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则北洋之防固矣。”其次，郑观应特别强调在沿海地带分区设防，实行重点防御。 到19世纪末，东南亚各国已被西方国家占据，这为西方国家的侵华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清政府武备空虚，“备北则南寡，备南则北寡，备中则南北俱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所以全面设防对清政府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为此，郑观应设计了分区设防、重点防御的海防战略。

郑观应认为，中国海岸线绵长，口岸林立，防不胜防。为今之计，“宜先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他所说的北洋起自东三省，包括牛庄、旅顺、大沽、烟台为一截，其中以旅顺、威海为重镇，“拱卫京畿”；中洋起自海州，包括崇明、吴淞、乍浦、定海、玉环、马江为一截，其中以崇明、舟山为重镇，“策应吴淞、马江各要口”；南洋起自厦门，包括汕头、台湾、潮阳、甲子门四澳、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直抵雷琼为一裁，其中以南澳、台湾、琼州为重镇。因此，郑观应提出由海军衙门派出一名大臣，为“巡海经略，总统北中南三洋海军”。三洋各设提督一名，每一提督下设左右二总镇为分统。“提督居大铁甲船，总镇驻中等轮舰，其余将弁各居所带之船。” 一旦海上有警，三洋水师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腰则首尾皆应。”如北洋有事，除大沽、旅顺、威海等处防守外，“宜分船两队。一防守海口，一出洋游弋”。防守者以两铁舰、两雷艇、一蚊子船为正军，一驻山东的成山角，一驻朝鲜的鸭绿江口，东西对峙，“见敌至即击之”。游弋者以四快船、八雷艇为奇军，“梭巡不绝，往来于成山，鸭绿之间，一遇敌船，则一面与之交仗，一面发电通传东西两营同出围击。如此布置，则渤海为雷池，威海、旅顺为堂奥矣。”

因此，郑观应特别强调在沿海地带分区设防，实行重点防御。具体来说，就是将沿海地区划分为北、中、南三洋，按其战略地位分别轻重，实施重点防御。而三洋之中北洋最为重要，他将其视为“元首”，中洋、南洋则分别为“腹心”和“肢体”。“为今之计，宜先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北洋“宜以旅顺、威海为重镇。势如环玦，拱卫京畿，则元首安也。”中洋“以崇明、舟山为重镇，策应吴淞、马江各要口，则腹心固也。” 南洋“以南澳、台湾、琼州为重镇。而控扼南服，则肢体舒也。”综上所述，郑观应海防战略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攻防结合，突破了单纯口岸防守的思想，充分发扬海军机动作战的性能，主张到大洋中去迎击敌人。他甚至提出：如南洋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迎击于海中。” 他围绕“攻”与“防”、“巡”与“守”两方面的论述，较之左宗棠的海防战略思想更具体、更实际，对后来的海防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郑观应还非常重视与列强的“商战”，为了“决胜于商战”，他提出首要的措施就是收回航权。

19世纪后半期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萌生并缓慢发展。他们“在政治上要求统治阶级实行民主化，使他们能够分享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要求改变重农抑商的政策，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他们要求国家作为一种脱离大众的公共权力必须具备抵御外侮、保护国防安全的功用，以保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郑观应的海防思想表现了当时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必须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是当时中国外患迭起、国势衰微这一基本国情在思想界的反映。”

首先，郑观应海防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把保卫海疆纳入国防战略，主张攻防结合，突破了单纯口岸防守的思想，更加具有近代海权思想的韵味。中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使得以中原地区为统治中心的中央政权在国防上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而非来自于海上的敌人，因而，长期以来形成了重陆轻海、安内重于攘外的国防思想，这种思想的不断发展，终于演变成明清之际的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之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统治阶级内部和下层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沉醉在天朝大国传统心态中，即便在受到西方国家入侵时仍沉湎于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传统以苟且偷安，而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甚至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筹议海防，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化海防的时候，仍被顽固派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郑观应故居的大门的正上方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

在此背景下，郑观应提出在北部和西北部要“防俄为先”，在西南“英法亦不可不防”的设想，在绵长的东部海疆分三洋海军重点防御，这种海防塞防并重的思想，无疑是对传统的重陆轻海政策的超越，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其次，郑观应海防思想的又一特点是主张把建立近代海防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海防建设实现近代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要求。郑观应认为，中国应“以商为本”、“工商立国”，先富而后自强，强调近代海防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建立海军的目的在于“卫商民，收防海之实用”，“张国威，护华商”。而发展工商业又为建立近代海防提供了物质保证。他说：“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没有财富的支撑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海防，而要达到府库充盈，以资海防，必须以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另外，郑观应还非常重视与列强的“商战”，为了“决胜于商战”，他提出首要的措施就是收回航权。郑观应深刻认识到，近代经济的发展已使各国贸易以海洋交通为主，因此，有无航权直接关系到本国工商业的发展。自1856年《天津条约》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来，中国长江航权在列强胁迫下几乎丧失殆尽，中国航运业不仅在外洋毫无地位可言，即使在内河也倍受列强航运公司压迫，步履维艰。为了收回航权，郑观应主张，一方面由政府大力扶助本国航运业，扩大规模，以与列强竞争；另一方面则“仿照日本，设法挽回”，即仿照日本建立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以逐渐收回利权。郑观应这种“寓兵于商”、“寓兵于工”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道轻器”思想的否定，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反映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富国强兵的理想与追求。

第三，郑观应海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民本思想。郑观应认为，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敌人是以近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依托，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防御型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郑观应认为要赢得反侵略战争，实现民族自强自立的梦想，必须坚持林则徐“民心可用”的思想，主张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建设巩固的海防。“所有沿海游手善战者，设法招募编伍成军。”“中国诸海口亦须节节设防，步步团练。综其大要者尤在收用海滨无赖闲民。”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